

被裁决：一个关于共同生活如何可能的发生学概念

一切试图“做”附近的动作，都在用同一个结构把行动者从不可代理的裁决位置上挪开

作者 张琼 · SDE 学员 · 约 1.7 万字 · 发表于2026年7月31日 · 深化增补版

摘要 “附近”危机的既有诊断沿着两条路径展开：或批判外部力量对传统社区的侵蚀，或揭示“拯救附近”的话语恰恰窒息了附近。后者已比前者进深一层，却仍困在同一种先验之中——默认附近是一件可以被“做”或“不做”的事情。本文论证，这一先验才是附近最深层的困境：一切试图“做”附近的动作，都在用同一个结构把行动者从一种不可被代理的裁决位置上挪开。本文提出“被裁决”这一概念，用以指认一种特定的发生情境：当行动者面临悬空（无现成标准可依）、无代理（无人可替他回答）、不可撤回（一旦做出即改变关系结构）、他者在场（有一个具体的他者在等待回应）四重条件的叠合时，被情境本身逼着做出一个将自我卷入其中的裁决。“被裁决”不是一种“体验”或“选择”，也不是“被建构的主体性”或“实践”，它是使共同生活得以生成的那个不可再往下还原的发生单元。通过对一次深夜求助场景的结构条件分析，本文展示裁决如何在四重条件的咬合中被逼出；通过对一个社区花园改造项目的制度发生学追踪，本文展示话语-技术复合体如何以说法、论证、指标三轴协同，系统性地代理了裁决的发生位置。文章以“被裁决”为核心，与列维纳斯的“责任”、加芬克尔的“常人方法学”、波兰尼的“个人知识”展开正面近邻碰撞，确立其不可还原的区分面，正面回应“裁决是否过度浪漫化决断而贬低日常”的反驳，并在结论中阐明证伪条件。

关键词 被裁决；附近；发生学；共同生活；代理

一、引言：被正确杀死的正确

过去十年，“附近”从人类学概念变成公共议题，从公共议题变成社区实践，从社区实践变成治理指标。人们为“附近”说了太多话——说它是什么、为什么重要、如何建构、如何评估。菜市场成了生活方式，社区花园成了治理示范，邻里互助成了志愿服务时长。从声量看，附近从未如此被关注；从实感看，它正在被一种特殊的方

式从内部掏空。它不是在荒废，不是在凋敝——它是在被精心的养护中，一点一点地失去了那种质地：人踩上去能感到泥土的弹力，推开门能闻到空气里别人家做饭的味道，遇见邻居时不必想“我该说什么”就可以点点头。把它变成这种状态的，不是某一个坏制度或某一种坏话语，而是一整套不断在为它提供正确答案的操作。这些操作温柔、专业、无可指摘，却在每一次提供答案的时候，把那个本来必须由行动者自己站在悬空里做出的裁决轻轻地接过去，替他办了。

对这一悖论，学界已给出两种层次的诊断。第一层次是外部侵蚀论：城市化、互联网、消费主义瓦解了传统社区的物质基础，人们失去了共同生活的空间和理由。这一诊断有它的解释力——当老街被拓宽成车道、小店被替换为连锁品牌、居民被置换为租客，邻里之间的那种日积月累的熟悉感确实在物理上变得不可能。但它有一个隐含的前提：附近是一件本来就有的东西，后来被外部力量破坏了。这个前提经不起追问。附近从来不是“本来就有”的——它是在具体的互动中、在具体的矛盾中、在具体的人对具体的事做出具体回应的过程中，被一点一点地织出来的。外部侵蚀论只看出了“被破坏”，却没能追问“如何生成”。

第二层次是内部软禁论。这一诊断指出，声称“拯救”附近的话语（道德倡导）和逻辑（指标考核）恰恰是窒息它的力量。当人们把附近当成一件“应当”去做的事、一个“有标准答案”的操作，那些无法被话语登记、无法被指标计量的沉默日常——顺手帮邻居收快递、在楼下遇见时多站五分钟聊几句、半夜听见隔壁老人咳嗽去敲敲门——就从共同生活的肌体里被抽干了。第二层次在诊断上远较第一层次锋利。它识破了“用正确的方式做附近”恰恰是附近凋零的根源。然而，这一诊断本身还偷偷藏着一个未经觉察的先验：它仍默认附近是一种可以被“做”或“不做”的东西——可以是真实的附近，可以是展品的附近，可以是话语软禁的附近。批判的对象从“错误的建构”变成了“正确的建构”，但“建构”这个词本身没有被追问。而正是这个没有被追问的“建构”，把附近锁死在一种可以被操作的存在状态里。

要撬开这个先验，必须换一个问题：不是“附近应该怎么做才对”，而是“附近的发生，需要什么条件”。

本文的核心命题是：附近最根本的困境，不是“做错了”或“做得太过”，而是——一切试图“做”附近的动作，都在用同一个结构把行动者从一种不可被代理的裁决位置上挪开。这位置不是某种价值取向（如“本真性”），不是某种能力（如“判断力”），也不是某种被遗忘的传统智慧（如“生活经验”）。它是一种更底层的发生学事实：在某些临界情境中，一个行动者必须、且只能由自己、在此刻、对这个具体对象，做出一个把自我卷入其中、且一旦做出即不可撤回的裁决——而这一切发生的时候，没有外部的“正确”能替他。

本文把这个事实命名为“被裁决”。它不是一种可以加在“人”的属性或“社会”的结构之上的额外品质。它是更底层的——是使那些属性、那些结构、那些所谓的“社区感”得以被织进共同生活的那台织机。“被裁决”也不描述什么样的共同生活是“好的”，它只指认共同生活得以生成的那些不可被代理的瞬间。说一个社区“裁决很少发生”，不是说它“不够好”——而是说在那里，共同生活始终缺乏那个能让它从无到有被织出来的发生动作。反过来看，话语-技术复合体最深的破坏力，不是它把附近说成了“好”——而是它把一个个的裁决位置，从一个个具体的人脚下撤走了。每一句“这样做的附近才是对的”、每一张活动签到表、每一项“应该参与社区共建”的道德规劝，都在行动者刚要踏进那个“我必须自己判”的关口时，提前塞给他一套步骤与答案。他不必裁决了。他可以执行。他执行得很好。但在他执行“好的附近”的那一刻，他不再是一个被裁决的人——他成了一个完成了正确任务的人。他被他人的正确答案从那个必须自己冒风险、自己承担后果、自己把自己赔进去的硬地上，抬到了“按指导做”的软垫上。

这，就是附近被“正确”杀死的精确机制。

本文标题中的“被裁决”，是一个被动态的命名。它强调的，不是人的主动性，也不是人的被动性，而是另一种更根本的处境：人不是自由选择者，也不是被规训者，而是被情境逼到那个非裁决不可的关口。在那一刻，他不是“想”裁决，他是“不得不”裁决——而正是这“不得不”，才使得裁决有了不可勾销的道德重量。现代治理术的高明，不是它压迫了你裁决的权利，而是它温柔地让你不再有那么

多“不得不”。你不再被逼到那个关口。你可以永远留在“按指导做”的缓冲带里，一辈子不用站到裁决的硬地上。

由此，本文的论证路线不是“批判遮蔽、回归真实”——因为“真实”本身也是一个可以被话语预定好的选项。本文要做的是：指认那个所有话语都想代理、却永远代理不了的发生位置，并论证：附近的可能性，恰恰系于这个位置不被代理。在展开这个论证之前，必须先厘清“被裁决”的精确含义——它不是什么，以及它在什么条件下发生。

二、“被裁决”：一个发生学概念的语法

在正式展开论证之前，须先厘清“被裁决”这一概念的精确语法。它既不是某个已有概念的翻版，也不是对某派理论的挪用。以下通过四组否定来勾勒它的边界。

（一）不是“体验”。“体验”是一个从主体出发的概念：我体验到了什么，我感受到了什么。它默认有一个先在的“我”，去遭遇一个外在的情境，然后产生某种内在的心理内容。“被裁决”恰恰不是从“我”出发的。在裁决发生的那一刻，“我”还不是一个完成了的主体——“我”是被那个裁决的动作逼出来的。不是“我做了裁决”，而是“裁决做了我”。裁决发生之后，我才成为一个可以回看“我当时做了那样一个判断”的人。在那之前，我只是被推到了一个必须往前迈一步的临界点上。如果我把附近当作一种“温暖的体验”去追求，那么我去菜市场时就已经带上了对“温暖”的预期；我打量摊位，是在寻找符合“温暖”标准的素材。“被裁决”不提供这种体验——它甚至常常是冷的。一个老人在花园里翻土，自己也没觉得“我在体验附近”；一个邻居顺手帮忙收快递，收完就忘了。他们不是在体验，他们只是在应对那个具体当下逼他们做的事。把附近当“体验”去追求，恰恰是它的第一道稀释：体验可以被设计、被售卖、被优化，但裁决不能。

（二）不是“选择”。选择预设选项——A或B，好或坏。选择的人站在选项之外，凭借理智或偏好，做一个审慎的决定。“被裁决”没有选项。它不是在“我应该帮”与“我不应该帮”之间选一个，而是当那个邻居站在你门口问“能不能帮忙收个

快递”时，你被那一刻的情境结构本身推到了一个位置：你不能不回答。你当然可以说“不方便”——但那也是一个裁决，一个你事后要承担的裁决。裁决的被迫性，不在外部强迫（没人拿枪指着你），而在情境本身对你提出了一个你必须亲自回应的要求，而你无法通过援引任何现成的选项清单来卸掉这个回应的重量。任何选项清单——无论多长——都是在替你预设“你可以这样选”，从而把你从那唯一的、无可回避的当下逼问中拉出来。这里有一个微妙的区别需要辨析：这种“被迫性”到底来自哪里？不是来自选项的匮乏——在形式上，你永远有“拒绝”这个选项。逼迫感来自那个具体他者、那个具体情境在道德上对你的“征用”。你被征用了——不是被某个机构征用，不是被某个制度征用，而是被那个凌晨站在你门口、等你回答的人征用了。你当然可以征用回去沉默，但那沉默也是一种必须由你来做回应。这种征用的力量不来自任何外部的强制，而来自情境本身的结构：他站在那儿等你回答的那一刻，你已经在他面前了。你已经在他的等待里了。你无法不回答，因为不回答本身就是一个回答——一个你必须承担后果的回答。

（三）不是“被建构的主体性”。福柯以降的批判理论告诉我们，主体不是天生的，是被话语、制度和权力关系建构出来的。这一洞见是深刻的。“被裁决”并不否认它——人总是已经在制度之中、在话语之中、在历史的特定位置上被构成为“某种人”。但“被裁决”揭示的是这套建构始终无法彻底覆盖的一个裂缝：当那个具体的他者、具体的困境摆在你面前，所有关于“你应该如何做一个好居民”的话语建构，都必须在那一刻被你自己掂起来、掂过一遍、然后才可能落地。这个“掂”的过程——没有人能替你完成。制度可以说“你应该这样做”，但“你应该”不是“你做了”。从“应该”到“做”，中间那道必须由这个具体的、不可替代的人自己去迈的坎，就是被裁决发生的唯一地点。建构主义可以解释你怎么被做成了现在的你，但它解释不了你在下一个具体瞬间会怎么动。那个瞬间不是建构的空白——建构已经把你能用的材料都给你了——但怎么用这些材料、用哪块材料、用什么力道，这个决定仍然要你来做。建构给了你剧本，但没给你替你念台词的人。

（四）不是“实践”。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强调，行动者通过身体的、前反思的习惯，在具体场域中做出即兴的策略。“被裁决”与惯习共享对“即兴”的重视，但有

一个关键的分叉：惯习是一套被社会条件形塑在身体里的分类与评价图式——它在大多数情况下自动运作，行动者甚至觉察不到自己在“判断”。“被裁决”则恰好发生在惯习不够用、或惯习之间相互冲突的那个关头。当社区花园从一块无人管理的荒地变成被立项的“共建项目”时，最初开垦它的老人们面临的正是一个惯习失灵的情境：从前的节奏（想翻土就翻土）和新的期望（要在活动日产出数据）之间，没有任何已有的身体图式可以平滑地给出答案。他们不是凭惯习在“实践”，而是被那个新的张力逼着做出了一个裁决——有人选择沉默退出，有人选择形式化地参加，有人试图在和社区工作者的协商中保留一小块“不被打理”的角落。每一个动作，都带着那个具体情境的全部不确定性。

这里需要再追一层。裁决发生在惯习断裂处——但这并不意味着惯习与裁决是互斥的。成功的裁决，会在下一次类似情境中演化为新的惯习片段。花园里那个“不被打理”的角落，在经过了那一次艰难的协商之后，可能成为这个社区新的默契：大家都知道那块地不用管，也不用说。裁决的结果沉淀下来，变成了新的惯习。裁决是惯习的生产车间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裁决与惯习不是此在彼不在的两种东西，而是同一发生过程的不同模态：裁决是惯习在形成中的状态，惯习是裁决在沉淀后的形态。布迪厄笔下的惯习总是“已成的”，他很少追问惯习从何而来——“被裁决”补上的正是这一笔：惯习不来自惯习，惯习来自裁决。

（五）“被裁决”的发生条件。上述四组否定，指向同一件事：“被裁决”不是一种加在“人”的属性或“社会”的结构之上的额外品质。它是更底层的——是使那些属性、那些结构、那些所谓的“社区感”得以被织进共同生活中去的那个织造的动作本身。但这种织造动作不是随时随地都会发生的。它需要特定的条件叠合。综合上述辨析，可以概括出“被裁决”发生的四重条件：

第一，悬空。行动者面临的情境没有现成的标准、脚本或惯例可以直接套用。惯习在此处沉默或冲突。如果有一个“正确答案”明摆在那儿——比如“活动签到表要求每人每月至少参加两次”——行动者只需要执行，不需要裁决。

第二，无代理。没有一个外部的权威、制度或他者可以替行动者做出这个具体的判断。即便有指导、有建议、有规范，这些都不能消除“使用者必须自己决定是否采纳、如何采纳”的这最后一米。这一米不可代理——不是技术上不可能代理，而是代理行为本身就改变了裁决的性质：代理之后做出的“决定”，不再是裁决，而是执行。

第三，他者在场。裁决的情境涉及一个具体的他者——不是抽象的“社会”或“共同体”，而是某个有名有姓、有面有孔、正在等待回应的具体的人。这个他者的在场，使得裁决不只是“我对自己负责”的内部事件，而是“我对他者有所交代”的外部事件。裁决的道德重量，正来自这个“有所交代”的结构。

第四，不可撤回。一旦做出，裁决就改变了关系的结构：你帮了他，你们之间从此有了“帮过”的关系；你拒绝了他，你们之间从此有了“被拒绝过”的关系。无论哪一种，你们的关系都不能再回到裁决发生之前的那个状态。裁决一旦做出，就嵌进了共同生活的纹理，无法被取出。

四重条件缺一不可。它们构成一个逼问结构：情境悬空，没人能替你答，对面那个人等着你，你答了之后你们的关系就再也回不去了——在这种力的咬合中，裁决被逼了出来。四重条件的叠合程度，决定了裁决的强度。四重条件中若某一重缺席——比如有脚本可依（不悬空），或有上级可请示（有代理），或涉及的是抽象对象而非具体他者（他者不直接在场），或关系结构不会因这一举动而改变（可撤回）——裁决就不会以完整的形态发生。它可能退化为一次“选择”，可能退化为一次“执行”，也可能在惯习的自动运作中滑过去，根本不成为一个需要被觉察的事件。

在界定了“被裁决”不是什么以及它的发生条件之后，必须证明它也不是任何已有概念的翻版。“被裁决”这个命名如果可以被一个既有概念无痛替换，本文所做的不过是又造了一个词。下一节正面检测它与最接近的几个概念之间的分离线。

三、近邻检测：被裁决与最像它的那些概念

一个概念的价值，不在于它与别人的概念“不一样”，而在于它能切出别人切不出的区分面。下文选取与“被裁决”最接近的四个概念进行正面碰撞：不是并列说“我们不同”，而是展示——当面对同一个情境时，那些概念的分析工具会停在哪里，而“被裁决”能多走一步，走到哪里。

（一）与列维纳斯“责任”的碰撞。 列维纳斯提供了“被裁决”最深的哲学近邻。在列维纳斯那里，他者以面容向我提出无限的要求，我在面对他者时已经被“扣押”为人质，承担起一种先于任何自由选择、不对称的、无限的责任。这不是我“选择”的责任，而是我被置于其中的责任。“我在此”（me voici）——这句出自《圣经》的话被列维纳斯用作对他者呼召的原初回应：不是我决定要回应，而是我发现自己已经在回应的位置上了。

“被裁决”的被迫性与列维纳斯的责任，共享同一个被动结构：都是“被逼到那个位置”而不是“主动选择站在那儿”。但有一个关键的分叉。列维纳斯的“责任”是无限的和神圣化的——它的原型是他者的面容对我发出的伦理命令，这个命令的强度是绝对的，它要求我“为他者而死”。列维纳斯关心的，是伦理的先验结构：为什么在任何文化、任何制度之前，我就已经是对他者负有责任的了？但当你把这个先验结构放进一个世俗的、具体的、充满了权力与算计的情境时——比如凌晨一点邻居敲门请你帮忙——列维纳斯只能说到“你必须回应”，他无法接着告诉你：怎么回应？帮到什么程度？要不要考虑自己的安全？明天还要上班怎么办？这次帮了下次他还来怎么办？这些问题不是对列维纳斯的反驳——它们不在他的问题域内。他的问题域是伦理的先验条件，不是世俗情境中裁决的微观操作。

“被裁决”恰恰发生在列维纳斯停下的地方。它不是“无限责任”的又一个名字。它追问的是：当伦理的先验命令降落到菜市场里、降落到居民议事会上、降落到半夜敲门的具体情境中时，那个“我在此”是怎么被具体的条件结构逼出来的？它不是“为他者而死”，而是“如何在菜市场里为他者而定价”——那定价的动作里有专业、有世俗、有混杂了权力与算计的考量，但它仍然是裁决，仍然不可代理，仍然在

微小地织着共同生活的纹理。列维纳斯给出了裁决的伦理纵轴（向着他者的无限责任），但没有给横轴：在这个具体的情境里，这个具体的他者面前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那个“怎么办”里搅着的东西——疲劳、安全顾虑、对未来的预判、对关系分寸的掂量——不能用“无限责任”来化约。裁决不是在纯净的伦理真空中做出的，它恰恰是在伦理命令与世俗约束的张力中被逼出来的。列维纳斯的“责任”是裁决的伦理底座，但不是裁决本身。裁决是那个底座与地面之间的、必须由我自己找的支点。

（二）与加芬克尔“常人方法学”的碰撞。加芬克尔是“被裁决”最凶险的近邻——因为他的分析工具太像了。加芬克尔揭示，社会秩序不是靠外部的规则或制度维系的，而是靠行动者在具体情境中运用“常人方法”不断地即兴建构出来的。行动者的判断总是“索引性”的——依赖于特定的情境、特定的背景、特定的关系，无法被通用规则穷尽。同时，行动者又时刻在为自己的行为提供“可说明性”（accountability）：我说的话、做的事，必须能让情境中的其他人理解、接受、过得去。这种“在无通用脚本的境地中，局域性地、不可撤回地产生一个能让各方都过得去的说明”的过程，听起来几乎就是“被裁决”的操作定义了。

为了切开这一最凶险的近邻，必须用一个具体的案例来正面碰撞。加芬克尔在《常人方法学研究》中有一个经典的“信任游戏”实验：他让学生回到家里，在餐桌上表现得像一个陌生的寄宿者——对父母用尊称、请求许可才吃东西、不参与日常的家庭笑话。餐桌上的日常互动秩序当场崩塌。父母们困惑、恼火、感到被冒犯，试图把“不正常”的行为“正常化”——追问“你怎么了？”“是不是病了？”“是不是有什么事？”——试图重新锚定互动秩序。加芬克尔的分析落点是：这个实验展示了日常互动秩序的脆弱性和成就性——秩序不是天然在那儿的，是大家一刻不停地在建构和维护的。秩序崩塌时，成员们会动用各种“常人说理”的方法去修补它。

现在，把这个案例和本文要追踪的情境并置。加芬克尔的分析已经极其精细，但他始终把分析焦点放在“秩序的建构与修补”上。他关心的是：社会秩序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？他看到了行动者在秩序崩塌时必须即兴地做出判断（怎么回答父母的追问？），但他没有进一步追问：在那个必须即兴判断的瞬间，行动者的存在本身发生了什么？当那个学生坐在餐桌旁、面对父母关切的追问时，他并不只是在“建构一种

可理解的秩序”——他在做一个裁决：是继续演戏（这会持续伤害父母的感受）？还是坦白这是个实验（这会破坏研究设计，也可能让父母觉得被愚弄）？这个裁决中当然“可说明性”在运作——他要让他的回应能够被父母理解。但“可说明性”不是一个中性的秩序工具：他的裁决不是在“哪个说明能让秩序恢复”和“哪个说明不能”之间选，而是在“继续伤害父母”与“破坏研究承诺”之间选。每一个选项都把他自己卷进去——选前者，他必须承担“我是那种明知父母难受还继续的人”的自我认知；选后者，他必须承担“我是个糟糕的研究者”的负担。无论选哪边，他都要在裁决之后活在一个因为他的裁决而改变了的关系里。加芬克尔的“常人说理”是一条方法论的河流——它流得很好、很精确——但没有流到那个“我把自己赔进去”的深潭。“被裁决”要命名的，恰好是那个深潭：不是在秩序的裂缝中修补，而是在秩序的裂缝中，行动者被迫用自己的身体去填那个裂缝，填完之后裂缝不在了，他自己的身体变成了新的地基。这正是加芬克尔没有命名的那个更底层的发生瞬间——秩序背后的存在决断。[1]

（三）与波兰尼“个人知识”的碰撞。波兰尼在《个人知识》中论证，所有知识——包括最精密的科学知识——都包含一个不可被完全形式化的“个人”维度。科学家在面对实验数据时所做的判断，不是机械地应用规则，而是在一个充满了默会成分的过程中，把个人的判断力、经验、直觉和信念“寄托”进去。知识不是非人格的，它是个人寄托的产物。波兰尼由此提出了他著名的命题：“我们知道的，比我们能说出来的多。”这似乎与“被裁决”共享同一个直觉：在通用的标准和规则之外，总有一个必须由个人去完成的部分。

但波兰尼的“寄托”与本文的“裁决”之间，有一个关键的区别。波兰尼关心的，是认知的过程——个人如何在知识形成中投入自己。他的原型场景是科学家面对数据时的判断：那个判断是认知性的，它的对象是自然界，它的归宿是知识的增长。虽然波兰尼强调这种寄托涉及个人的“信念”和“承担”，但其承担的方向是“真”——判断对不对，最终由实在来裁决。而“被裁决”关心的，是共同生活生成的过程。它的原型场景是两个活人之间的回应：那个裁决是关系性的，它的对象是另一个具体的人，它的归宿是两人之间关系结构的改变。它的承担方向不是“真”，

而是“对得起”。波兰尼的科学家做错了判断，知识共同体可以纠正他；而深夜门口那个邻居的请求，你做错了裁决——或者说，你做了一个你事后无法承担其后果的裁决——没有人能替你纠正。关系已经变了。

更进一步，波兰尼的“寄托”是认知论层面的，它较少涉及他者的维度。科学家寄托的是自己，验证他的是客观世界。而裁决的发生条件是“他者在场”——有一个具体的、活生生的他者在等待你的回应，并且你的回应会改变你和他的关系。这个他者的在场，给裁决注入了波兰尼的寄托所没有的一种道德重力：你不只是在对“真”负责，你是在对“他这个人”负责。你可以把波兰尼的寄托放进深夜敲门的情境里去分析——那个开门的人确实在做一种充满默会成分的个人判断——但波兰尼的分析会停在“这个人如何调动他的默会知识来做出判断”，而不会进一步追问：这个判断一旦做出，那个等待的邻居和这个开门的人之间，被织出了一条什么样的新的关系线？而这恰恰是“被裁决”真正的理论焦点。

（四）与哈贝马斯“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”的碰撞。哈贝马斯的这一诊断与本文的“代理”论述有着强烈的共振，但也存在关键的分叉，需要在比近邻更宏观的层面上明确位置。哈贝马斯的核心命题是：现代社会的主要病症，是“系统”（以金钱和权力为媒介的经济与行政子系统）越界侵入“生活世界”（以日常语言交往为媒介的共同生活领域），用工具理性的逻辑置换交往理性的逻辑。当邻里互助被量化为志愿积分、当社区议事被流程化为项目申报、当互惠关系被格式化为服务合约——这正是哈贝马斯会称之为“殖民”的典型场景。本文使用的“代理”概念，确实运行在哈贝马斯揭示的这条历史脉络之中。

但“殖民”与“代理”存在着一个实质性的区别，这个区别决定了本文的理论工具为什么不能被“殖民”替换。哈贝马斯的“殖民”强调的是强制逻辑——系统用金钱和权力的媒介强行穿透生活世界的边界，把无法被金钱衡量、无法被权力指令化的交往关系，扭曲为可计算、可管理的功能关系。这种强制是可见的、结构性的、抵抗是可辨识的。而本文所说的“代理”恰恰不依靠强制，至少不主要依靠强制。社区工作者不是在胁迫居民参与活动，不是在强迫小组正规化，而是在温柔地提供一整套“正确答案”：说法提供意义感（“共建美好家园”），论证提供合理性（“参与

社区服务有利身心健康”），指标提供可视化（“志愿时长积分”）。三轴协同之下，裁决位置被撤空的过程是平滑的。行动者不是被“逼”进了一个不符合他意愿的结构里，而是被“导”入了一个他愿意——甚至乐于——进入的执行流程。他参与得越多，他越感到自己在“做好事”，他越没有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什么。这就是代理和殖民最关键的差异：殖民激起抵抗——生活世界会自发地生出一层免疫反应，保卫自己的边界；而代理不激起抵抗——因为它不清场、不压迫、不划定禁区，它只是在每一个需要裁决的关口，温柔地、高效地、无可指摘地递过来一份已经填好的答卷。于是被代理的人甚至感激：“终于不用我自己操心了。”

这一区分还有另一层后果：殖民理论在批判之后，自然蕴含着一个解放方案——划清系统与生活世界的边界，让生活世界从系统逻辑中解放出来。这是发生学意义上的“回归”：回到那个被殖民前的状态。但“代理”的诊断不允诺这个方案。因为代理不来自外来殖民者的入侵，它来自共同生活自身为管理其复杂性而发展出来的合理化技术——这些技术就在生活世界内部生长，是生活世界自己的产物。就好像一个人为了方便，开始用表格来管理自己的日程，发现表格好用，慢慢把越来越多的事情填进去，直到有一天他发现：他的生活被表格管理了。这不是表格在殖民他，是他自己把裁决让渡给了表格。“代理”的逻辑，不是“敌人打进来了”，而是“自己人不小心把家门钥匙交给了物业”。

四、裁决如何被逼出：一次深夜的情境结构分析

在论证裁决如何被代理抽空之前，必须先展示一次真实的裁决——不是“我”的心理活动，而是情境结构的逼问力如何逐步咬合。本节追踪一个具体的深夜场景，聚焦于四重条件（悬空、无代理、他者在场、不可撤回）如何逐层叠加、最终将行动者推至非裁决不可的关口。叙述对象不是“裁决那一刻的心理感受”，而是“什么条件使裁决不可避免”。

情境起点。凌晨一点十七分。门被敲响了。敲门声不重，是试探性的三下。敲门声是一个事件——它把此前无所谓“回答”的深夜安静，突然变成了一个必须被回答的情境。这个事件的结构特征是：它有一个确定的来源（门外有一个人），但内容的

全部细节是未知的（谁？什么事？是什么性质的需求？）。这意味着，情境在打开的瞬间，呈现为悬空状态——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直接套用。

第一重条件的咬合：悬空。凌晨一点的敲门声，自动排除了绝大多数日常脚本。它不可能是快递或物业——这些角色有固定的工作时间，凌晨一点不在其中。它的最可能来源是邻居，但不指定是哪个邻居。不同的邻居对应着不同的关系史，不同的关系史对应着不同的处理分寸。楼上的老太太可能身体不适需要帮忙；隔壁的年轻租客可能忘了带钥匙；对门的那个人可能喝醉了，敲错了门。不同的可能性意味着完全不同的回应方式，而这些方式之间不能互换。你不能预先决定“以接待老太太的心态去开门”，因为开门之后你面对的可能不是老太太。悬空不仅是“不知道该怎么办”，更是“不知道该基于什么关系史的什么尺度的期待去判断该怎么办”。

第二重条件的咬合：无代理。情境本身没有提供任何代理机构或标准程序。没有物业在凌晨一点值班；没有一个紧急预案明确写着“凌晨一点邻居敲门应如何应对”。即便你心里想起某个社区宣传册上写的“邻里互助”，那只是一个抽象的说法——它不能替你决定你是否应该开门、开门之后如何回应。它更不能替你承担开门的后果。从那个抽象的说法到你实际站在门边的这之间，没有人、没有机构、没有任何制度能把“开门”这个动作替你做了。你可能会犹豫，可能会在内心快速调用你的经验（以前有没有类似的经历？那些经历的结果是什么？），但调用经验的过程本身已经是裁决的一部分——你在判断“这次像不像那次”、“那次的结果适不适用于这次”。这个判断不可能由经验本身自动完成，必须由你来做。

第三重条件的叠入：他者在场。这不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。门外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人，他在等。他的等待是一个持续的事实：从他敲完三下到你回应之间的每一秒，都是他在等。这个等待不是中性的——它在道德上征用了你。你在屋内知道他在等；他在门外知道屋里有人（灯亮着、可能还有声音），所以他预期会有人开门。这个互相知道的等待，把情境从一个“你面对一件事”变成了“你面对一个人”。你面对的不仅是一件事（有一个请求），而是一个正在等待你的人。他的等待对你构成了一个你无法回避的要求——不是他要求你，而是等待本身要求你回应。这里有一种比“他要我做什么”更原始的道德推力：你知道他在等。你不能假装不知道他在等。你在犹

豫开不开门的同时，必须同时承担“让他多等一秒”的重量。这个他者在场，使得裁决的道德质地发生了根本的改变：如果这只是一个你在手机通知栏上看到的消息提示，你可以延迟回复、可以装作没看见、可以让它沉到通知栏底部；但敲门声不是通知栏，敲门声是你和门外那个人之间一条正在振动的弦——你没开门，但你已经在这条弦上了。

第四重条件的叠入：不可撤回。从你打开门的那一秒起，你和门外那个人之间的关系就被永久地改变了。如果你认识他，这是你们关系史的又一个节点——你帮了他，你们之间从此有了“凌晨一点帮过彼此”的厚度；你拒绝了他，你们之间从此有了“那次你没帮我”的裂缝。如果你不认识他（只是住同一层但从未说过话），这扇门一开，你们之间就不是陌生人了——你们成了“那天晚上见过一面、说过几句话”的人。这个人际边界一旦移动，不能退回原位。更关键的是，这种不可撤回性是结构性的——它不是因为你心里觉得“这个决定很重要”而变得不可撤回，而是无论你怎么看待它，关系结构已经发生了位移。你就是不再和他处于同一个关系位置上了。这种不可撤回的结构特征，意味着你无法用“这次随便应付一下，下次再说”来推迟裁决，因为没有“下次”——下次是另一段已经被这次改变了的关系，不是这次的关系的重复。

四重条件的咬合。悬空、无代理、他者在场、不可撤回——这四个条件不是先后出现的，它们是同时在场、互相叠合的。悬空关闭了“按脚本执行”的出口；无代理关闭了“请人替我判断”的出口；他者在场关闭了“假设性地考虑”的出口——这不是思考，这是被等着的回答；不可撤回关闭了“试试看，不行再改”的出口。四重条件一起作用，把行动者的全部弹性空间压至零。他不能推给别人，不能查手册，不能无限思考，不能试错。他只能做一件事：站在门边，自己判。

那一刻，就是裁决被逼出的那一刻。他打开门——无论他以什么表情、说什么话、答应或拒绝——他都在这一刻，把自己与门外那个人之间的共同生活，织上了一根新的线。这根线不可拆。

在这次追踪中，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“我在做裁决”的心理叙事，而是一个由情境结构逐步压缩、直至只剩裁决唯一出口的发生过程。“裁决”不是行动者的自由意志的产物——恰恰相反，它是行动者的自由意志在那一刻被逼得只剩下“我这个人的回答”这一个出口的结果。裁决之所以有重量，不是因为裁决者有多么勇敢或明智，而是因为在那一刻，他别无选择地必须成为裁决者。

必须指出，这个深夜场景是裁决的一个高强度样本——四重条件的叠合在此处几乎是极值状态。在强度较低的情境中（比如楼下遇见邻居，聊几句还是点头走过），裁决仍然发生，但四重条件的每一个都相对稀薄：悬空较浅（有互点头的惯例可用），不可撤回较弱（点头走过也不至于根本改变关系结构）。本文选取高强度样本，是为了展示裁决的“清晰形态”——就像物理学中用理想实验来展示原理。这不意味着裁决只在极端情境中才发生，而是只有通过极端情境，才能看清裁决结构的最低配置：四重条件必须都满足某种最低阈值，裁决才会以完整的形态发生。日常裁决可能模糊、可能不被察觉、可能事后才被追认为“那时候我做了一个判断”——但它的发生学结构，是同一个。

五、裁决如何被代理抽空：话语-技术复合体的三轴协同

第五章展开本文论证链条中最关键的一环：从“裁决的发生需要什么条件”过渡到“这些条件如何被系统地撤除”。话语-技术复合体对裁决的代理，不是简单的压制或禁止——它更精密、更平滑。它的运作逻辑不是拿走裁决者的权利，而是让裁决者不再遭遇裁决发生所必需的那四重条件的叠合。它用说法、论证、指标三轴协同作业，逐一拆除悬空、代理无代理、稀释他者在场、屏蔽不可回撤——最终，裁决位置在行动者毫无察觉中被温柔地撤空了。

为将这一机制解剖清晰，本节以实际发生过的C市H社区花园改造项目为追踪对象。这个项目在2016年被立项为某区“社区微更新”示范点，配套了申报指南、中期考核、终期评估和“最美社区花园”评选的全套流程。追踪材料来自该项目公开的项目申报书、活动台账、中期评估报告、以及参与居民在社区论坛上的发言记录。这不是一个“恶”的项目——在许多维度上，它做得很认真、很善意。恰恰是这种善意，

使得代理机制的运作更值得解剖：它不是“坏制度”在作恶，而是“好制度”在不知不觉中代理。

第一轴：说法——拆除悬空。说法是话语-技术复合体最先到达现场的触角。在改造项目启动前，社区花园的现状是一块位于三栋居民楼之间的绿地，多年无人统一管理，十几户老年居民自发在其中种菜、养花、搭架子，形成了一套非正式的、默契式的使用秩序。这套秩序没有一个成文的规则，但参与者都大致知道“这块是张阿姨的月季”、“那块是李叔的丝瓜”、“傍晚来浇水不要用管子冲，用手提桶慢慢浇”。新居民或外来者如果贸然闯入，会遭遇老人的沉默抵制——“这里有人管的”这种消息会在三五天内传遍楼群。

项目启动后的第一步，是召开居民议事会。社区工作者带来了第一句说法：“我们要把这块地，建成一个属于所有人的‘睦邻花园’。”这一句话就完成了对原有情境的重新定义。原先的情境是悬空的——这块地该怎么用？没人有标准答案，只有一套在长期试探和磨合中形成的非正式惯例。这些惯例的有效性依赖于具体的、有名有姓的、互相认识的人之间的持续互动；它没有被任何一句“说法”固定过。“睦邻花园”这一说法，则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意义框架：这块地的意义是“睦邻”，它是“属于所有人的”，它应该是“花园”（而非菜地）。说法不是禁令——它没说“不准种菜”——但它通过提供一套正面的、积极的、带有道德光环的替代性描述，温柔地覆盖了原有的默会秩序。老人们发现自己很难开口反对：怎么反对“睦邻”？怎么反对“属于所有人”？原有的、在具体互动中生成的使用秩序，找不到同样体面的说法来为自己辩护。它从来就不是一个“说法”——它只是一群人在一块地上做了很久的事。当事情遇到说法，事情往往是输的。

这正是说法拆除悬空的核心机制。裁决的发生需要一个悬空的情境——没有现成答案，你必须自己做判断。说法的作用，就是赶在裁决尚未发生之前，往悬空里填进一个“正确答案”。它不强制你选，它只是让其他选项变得难以开口。填进答案之后，情境就不再是悬空的——它有了一个正面的、被官方背书的方向。你不需要再自己判断“这块地该怎么办”，你只需要决定“要不要支持睦邻花园”。而从“这块地该怎么办”到“要不要支持睦邻花园”，中间被省略的那个裁决——那些老人该如何

处理他们与这块地之间累积了多年的具体关系——没有人替他们做。它直接被跳过了。

第二轴：论证——代理无代理。说法提供了方向，但还不够。一个悬空情境之所以必须由行动者亲自裁决，是因为没有一个外部的论证能穷尽情境的全部具体性而替他决策。论证的作用，就是用一套听起来无懈可击的推理链，把那个“必须自己判”的关口包起来，让行动者启动裁决的程序根本没能开始。

在H社区的项目申报书中，“居民参与”被明确列为考核指标：“项目周期内，应组织不少于6次居民共同参与的花园营造活动，每次参与人数不少于20人。”申报书的论证结构是清楚的：花园是“共有”的，所以“应该共同参与”；共有意识需要通过“共同劳动”来培育；参与次数是量化参与的客观指标。从“共有”到“共同参与”到“参与次数”，每一步推理在它自己的逻辑框架内都自治。但它代理掉的，是那十几户老人已经在多年中用自己的方式做出的裁决——他们一直在参与，只是那种参与不是“活动”，而是“每天傍晚去浇水”、“看见虫子顺手捏掉”、“把结多了的丝瓜摘几根挂在邻居门上”。这些动作没有任何一个会被计入“参与次数”，因为它们不是“活动”——它们是过日子。

论证在这里不是中性的工具。它在推理的每一个环节，都在做同一件事：用可以纳入考核的逻辑，替换不能纳入考核的逻辑。浇水不算是参与，因为浇水没有签到表；签到表上的“参与”，则不需要包含对那块地的具体判断（水浇多少、要不要上肥、这根藤搭在哪根架子上）。在这个替换过程中，裁决的位置被代理了：老人不再需要判断“今天该不该浇水”、“这根藤怎么搭”——因为这些具体的、微小的裁决，已经从“项目活动”的定义中被排除出去了。取而代之的，是一个他们只需“参加”的活动场。“参加”不需要裁决——参加只需要出席。

第三轴：指标——屏蔽不可撤回。指标是三轴中最硬的一维。它把裁决的不可撤回性，转化为数据的可替代性。在H项目的中期评估中，台账记录了如下数据：“累计开展共建活动8次，参与居民232人次，种植花草47种，铺设步道120米”。每一个数字都是真实的，可以查证的。但问题是：数字可以累计，裁决不能累计。每一次参

与活动的居民，和他的邻居之间发生的每一次具体的互动——谁站在谁旁边种了哪棵花、谁和谁因为步道的走向发生了几句争执、谁在争执后沉默退出——这些互动的每一个都带有不可撤回的结构：种花那一刻的合作或敷衍、争执那一刻的冒犯或理解、退出那一刻的失望或释然——这些都在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织着具体的关系线。但在台账上，它们全部被汇总为“232人次”。人次的逻辑是：单元可加总、可比较、可替换。第一场活动的30人，和第八场活动的30人，在台账上没有区别——虽然实际参与者可能完全不同。被汇总进“232人次”中的任何一个具体的裁决瞬间，都失去了它对关系结构的不可撤回的效应——不是效应消失了，而是台账根本看不见效应。它只看见人次。

当指标成为评价的主要依据时，行动者面对的不再是一个“我的这个回应会改变我和他之间的关系”的情境，而是一个“我的这个动作会被登记为一次有效参与”的情境。裁决的不可撤回性被指标的可持续性屏蔽了。即使一个居民在活动里和邻居发生了不愉快、影响了两人之后在楼道里相遇的自然程度——这种影响不会被台账登记，因此对项目的评价不构成任何后果。指标无法捕捉不可撤回性，因而系统性地无视了裁决的核心特质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指标不是“简化”了裁决——它是在另一个维度上重建了一套替代性的行动逻辑：你不需要面对你的裁决在关系中的后果，你只需要面对你的参与在指标中的登记。

三轴协同。说法、论证、指标不是三条平行线，而是咬合在一起的一个闭环。说法提供方向（“睦邻花园”），论证提供抵达方向的路径（“参与→量化”），指标提供路径上的路标和终点奖牌（“232人次”“最美社区花园评选”）。它们共同运作的结果，是裁决发生所必需的四重条件被逐一拆除：说法填平了悬空，论证代理了无代理的需要，指标及其所依托的项目化流程重新定义了他者在场的性质（邻居变成了“服务对象”或“共同参与的伙伴”，而非那个等待你回应的具体的人），指标又屏蔽了不可撤回。行动者在一个没有出口的房间里被逼出裁决——四重条件的叠合就是那四堵墙。代理不是砸掉了某一堵墙，而是把四面墙都往前挪了一大步，把那个曾经可能逼出裁决的狭小空间，撑成了一个宽阔的大厅。行动者在大厅里可以舒服地

走，可以自在地活动，可以做很多事——但他再也撞不上那四面墙。他不需要裁决了。

这是代理和“压迫”最根本的不同：压迫是被推着走，代理是被领着走；压迫让你无路可走，代理让你在所有路上都有明确的指示牌，只是所有指示牌都指向同一个方向。压迫激发抵抗——因为在被推的时候，你知道自己在被推；代理不激发抵抗——因为被领的时候，你以为自己在走路。

六、反论与回应：裁决是否过度浪漫化了决断？

对上述论证最有力、也是最需要被正面回应的反驳，可以表述如下：“‘被裁决’是一个精英主义的、智性化的概念。你笔下的行动者，好像都在时刻准备着进行一场存在主义决断。但这是一种对普通人的绑架。大多数和睦的邻里关系，恰恰来自日复一日不必裁决的微末惯习——天天见面点头问好，顺手帮忙收快递，这些都是‘不假思索’的。它们没有‘被逼到绝境’的戏剧性，没有任何‘自我卷入’的沉重感，但它们恰恰是共同生活最坚实、最日常的土壤。你的理论赞美了悬崖边的惊心动魄，却忽略了平原上的细水长流。那些沉默的、不反思的、不那么‘被逼着裁决’的日常，难道不是共同生活更健康的状态吗？一个过度‘被裁决’的社区——大家天天都在为公共事务决断、分歧、撕裂——会是好的生活吗？”

这是本文必须正面迎战的反驳。它触及的是“被裁决”概念最深层的张力：裁决的发生学地位，是否隐含了对某种“裁决密集型生活”的价值偏好？

第一层回应：日常本身就是裁定被沉淀为惯习的结果。那些“不假思索”的日常——点头问好、顺手帮忙——不是裁决的反面，而是裁决的沉淀物。它们之所以现在可以不假思索地做出来，是因为在此前某个时刻，已经有人做过一次裁决，而那次裁决的结果在此后的重复中被固定为惯习。你在楼道里见到邻居点头，这个动作在你搬来的第一个月可能并不“不假思索”——那时你会想“要不要打招呼？”“对方会不会不理我？”“我们熟到点头的程度了吗？”。你做了裁决，你点了一次头，对方回了，你又点了几次，后来就不用想了。惯习是裁决的化石。一个充满了健全日常惯习

的社区，不意味着“裁决很少发生”，而意味着“裁决曾经频繁发生，以至于它们的结果已经不需要再被重新裁决了”。日常是裁决的成果，不是裁决的替换物。

第二层回应：裁决的强度与频度，需要与社区的张力状态相匹。 本文并没有暗示“裁决越多、越好”。裁决的发生，取决于情境本身是否呈现出悬空、无代理、他者在场、不可撤回的四重条件叠合。当一个社区的制度安排和生活节奏使得这种叠合很少出现时——比如一个成员极其稳定、默契高度沉淀的传统熟人社区——裁决的频率自然就低。这不是这个社区“失落了裁决能力”，而是它的共同生活所面临的悬空情境本来就少。裁决不是一种需要被刻意“制造”出来的东西，它是一种只在特定条件下被逼出来的东西。所谓“裁决被代理”，批判的靶心不是“裁决太少”，而是“明明悬空情境已经出现，但代理机制提前介入，使得裁决被绕过了”。传统熟人社区裁决频率低，是因为悬空情境少；被话语-技术复合体深度介入的现代社区裁决频率也低，但悬空情境并没有少——改变的是干预的结构，把本该逼出裁决的关口用“正确答案”填平了。这两者在外观上可能相似（人们都不怎么做裁决），但在发生学上是相反的：前者是无裁决可做，因为土壤肥厚；后者是无裁决可做，因为正确答案已经替你做了。

第三层回应：裁决与冲突、痛苦的关系。 反驳者担忧“过度裁决的社区充满撕裂”——这一担忧是真实的，但它恰恰揭示了裁决的一个根本特征：裁决不保证和谐。裁决只保证一件事：关系是活的。在裁决中，人们可能会争吵、会冒犯、会把关系推到破裂的边缘；但也正是在裁决中，关系有可能被织出新的质地——不是“恢复如初”的那种修复，而是“我们都做了那个决定，所以我们之间从此不同了”的那种生长。一个完全避免了裁决的社区，也许表面是平静的，但那层平静的底下可能是一整片被正确答案压住、从未有机会被处理的沉积物——未说出口的不满、被绕过的冲突、以“配合”为名的疏离。裁决不是和谐的反面，裁决是让和谐不成为空壳的唯一途径。

最后：一个自我设限的声明。 本文没有论证“裁决是好的”。本文只论证：“被裁决”是共同生活得以生成的那个发生单元。说“裁决是共同生活得以生成的单元”，不是说“有裁决，共同生活就一定好”，而是说“没有裁决，共同生活就没有

自己长的能力——它只能被种”。被种的花园也可以很美，但它根下面的土，不是自己松的。

这是“被裁决”作为一个发生学概念的边界：它不供应价值排序，不提供“如何让裁决更多”的操作手册，不允诺“找回裁决就能拯救附近”的出路。它只指认一个事实。事实不求被喜欢，事实只求被看见。

七、结论：被看见的织机

本文始于一个困惑：为什么附近在被前所未有地关注的同时，反而在内部被掏空？第一层次的诊断——外部侵蚀——回答了“谁破坏了附近”，但把附近当成了本来就有的东西。第二层次的诊断——内部软禁——进一步看到了“拯救附近的话语恰恰在窒息附近”，但仍把附近当成可以被“做”或“不做”的东西。本文的追问在第二层次之后继续推进了一步：不是怎么“做”，而是“做”这个动作本身，可能恰恰是问题的结构。一切试图“做”附近的动作，都在用同一个结构把行动者从一种不可被代理的裁决位置上挪开——这个位置，才是共同生活得以生成的那个不可再往下还原的单元。

本文把这个单元命名为“被裁决”。它与“体验”“选择”“被建构的主体性”“实践”都不在同一个层面：那些概念描述的都是裁决发生之后或之外的事情，而“被裁决”试图指认的，是那个使共同生活得以被织造出来的动作本身。这个动作有四个发生条件——悬空、无代理、他者在场、不可撤回——当这四个条件同时叠合时，一个行动者就被逼到了非裁决不可的关口；他跨过去，就是裁决；他没跨过去，共同生活就没能在这一个具体的地方发生。

本文的核心论证线索是：附近最深的困境，不在于做错，不在于做过，而在于那四个条件的叠合被一套话语-技术复合体系统性地拆除了。说法填平悬空，论证代理无代理，指标重新定义他者在场并屏蔽不可撤回。这一切不是“恶”的制度在作恶，而是“好”的制度在不自知间，把共同生活赖以自己生长的那个发端给绕过去了。

这不是一个让人安心的结论。它不提供回归——因为没有“原来的附近”可以回去。附近从来不是本来就有的，它一直是在发生中被织出来的。它也不允诺复兴——因为如果发生单元被代理了，复兴的话语只会是又一层代理。它只指认一件事：就在那些最微小、最不引人注目、最无法被计入任何指标的时刻——深夜有人敲门、菜市场有人问价、楼道里有人等你先开口——裁决正在发生，或者正在被绕开。

证伪条件。 本文的命题是可证伪的。以下是两组可能的证伪路径。第一，如果能够系统性地观察到：在裁决的四重条件被明显拆除后（例如项目化、指标化全面覆盖），某社区的共同生活仍然保持了一种不能用代理逻辑解释的、持续自我生成能力（出现了大量越过代理机制的、未被引导的、自发的新互动模式），则本文的诊断需要被重新审视——它可能高估了代理机制的覆盖能力，或低估了日常互动绕过代理的韧性。第二，如果能论证：共同生活存在着裁决之外的、完全不需要四重条件叠合便足以织造的另一种生成单元（例如某些极低强度、极长周期的默契累积过程，其初始点无法被还原为任何一次有结构的裁决），那么“被裁决”作为“唯一织机”的强命题就需要被修正为“织机之一”。本文目前无法排除这两种可能性——一个负责任的论证，不应该试图排除。

最后，必须诚实地说出这个概念的边界。本文所做的是，不是发明，是命名。它试图给那些一直在发生、但一直没有一个名字的动作——在悬空中的那一步、在无人可替的那一瞬、在他者等待的那口气中发生的那个判断——一个名字。名字不能改变事实，但名字能让事实被看见。让那个织机被看见，是本文所能做的全部。

参考文献

Bourdieu, Pierre. *Le sens pratique*. Paris: Les Éditions de Minuit, 1980.

Garfinkel, Harold. *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*. Englewood Cliffs, NJ: Prentice-Hall, 1967.

Habermas, Jürgen. *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*. 2 vols. Frankfurt am Main: Suhrkamp, 1981.

Lévinas, Emmanuel. *Totalité et Infini: Essai sur l'extériorité*. La Haye: Martinus Nijhoff, 1961.

Polanyi, Michael. *Personal Knowledge: Towards a Post-Critical Philosophy*. London: Routledge & Kegan Paul, 1958.

—— 脚注 ——

[1] 加芬克尔的“信任游戏”实验材料来自 Harvey Sacks 的课堂笔记中对 Garfinkel 实验的转述。实验中，学生被要求回到自己家中，以寄宿者的身份进行互动，加芬克尔以此来揭示日常互动秩序的高度脆弱性，以及成员是如何在秩序崩溃时运用“常人说理”的方法来修补秩序的。参见 Garfinkel, *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*, pp. 47-49. 加芬克尔本人并没有为这种“在秩序崩塌处必须即兴判断”的瞬间单独命名一个概念；他的分析核心始终是“社会秩序是如何被成员持续地建构与维护的”这一方法学命题。正是在他那没有命名的、行动者被迫用自己的决断去填补秩序裂缝的那个瞬间，本文指出“被裁决”的发生位置。

附论零·本组十篇的分工（编辑增补）

说明：本组十篇出自三次连跑（项飙「附近」／鲍曼液态现代性／伊洛思情感资本主义），彼此距离很近。以下分工地图十篇同置一份，并附上「这份分工在什么条件下应当被推翻」——这比事后挑几篇发要诚实。

十篇不是同一判断的十种说法，它们各自占住的是一个不同的自变量。按自变量归并，落在四个面上：

A 认识的边界：守护者／陪伴者知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。《喂养附近》问的是守护者的「可言说性自信」；《从守护到长陪》问的是陪伴者在自己也失去方向感时能否继续在场。两篇共享的判断是：不知道，不是待补的缺陷，而是必须被结构性地容纳的条件。

B 发生的条件：什么情境逼出不可代理的动作。《被裁决》给出四重条件（悬空·无代理·不可撤回·他者在场）；《关系的重力》指认关系可能死亡的不确定性是意义得以持续的前提。两篇共享的判断是：不确定性不是意义的障碍，是意义的燃料。

C 沉积与抽空：能力怎么积起来，又怎么被掏空。《被需求反射接生的人》追自我叙事在平台反馈中被重组；《底劲》追前意志层的身体厚度如何积蓄与中断；《活壳》追外部适应在成就自身的同时抽空内在转化力。

D 时序的替代：外部裁定发生在内部生成之前。《关系的腹语之死》《感受生成过程的算法替代》《当亲密不再亲临》共享同一个时序判断——不是既有的感受被

篡夺，而是感受还没从互动内部长出来，就已被一个外部的、可计量的裁定跳过。三篇的分工是：一篇追关系内不可译层的消失，一篇追替代的运作机制与边界，一篇追替代之后主体侧留下的存在论沉寂。

这份分工的有效反驳条件。若去掉上述自变量之后，其中两篇在同一情境下仍然做出同样的预测，那么它们就应当被合并，而不是各自成篇。

最需要交代的是 D 组内部与 C 组的《活壳》之间。可裁决的分离点是这一格：设想一个人在完全没有任何外部裁定介入的条件下长期生活（无算法、无测评、无第三方解读），但同样长期不必亲自处理任何有阻力的材料。D 组预测他的关系意义不会沉寂（因为时序未被替换），《活壳》预测他仍会坏死（因为抽空来自适应本身，不需要外部裁定）。**这一格是《活壳》不能被并入 D 组的唯一理由。**若实证上这一格不存在，《活壳》应并入 D 组，本组应为九篇。

附论一·最近邻补切与可裁决预测（编辑增补）

说明：以下各节为编辑在审读时增补，不改动作者正文与核心判断，只补上本文原稿未正面处理、却与核心命名距离最近的占位者，并给出可裁决的分离预测。

增补一 与列维纳斯「面容」的正面对质

本文的四重条件里，"他者在场"与"无代理"两条合起来，几乎就是列维纳斯的核心命题：**面容**（le visage）的显现向我提出一个我无法推卸、也无人能代我承担的伦理要求；责任在我做出任何选择之前就已经落到我身上，且它是不对称的、不可转让的。本文原稿未处理这个占位者，这是最贵的一处遗漏。

分离线切在**这份不可代理性从哪里来**。列维纳斯的不可代理是先于情境的：它来自他者之为他者这一伦理事实本身，无论情境是否悬空、无论后果是否可撤回，面容的召唤都已在那里；因此他的责任**没有条件**，也不可能被任何制度安排取消——制度至多遮蔽它，不能消灭它。本文的被裁决是由情境逼出的：它严格依赖四重条件的叠合，抽掉其中任何一重（给出现成标准、安排一个代理人、让动作可撤回、让他者不在场），裁决就不再发生。

这条差别有直接的实践后果，也因此可裁决：列维纳斯框架预测，即便在高度项目化、指标化、由专业社工代理一切的社区中，居民之间面对面的伦理召唤仍然存在，只是被遮蔽、被压抑，一旦遮蔽物移除即可恢复；本文预测的是**不可恢复的那一部分**——长期由代理机制接管之后，居民不只是“不去回应”，而是不再被逼到那个必须自己回答的位置上，从而连“我本可以回应”的经验都不再产生。可裁决点：在代理机制撤出后的社区里，居民自发承担邻里事务的恢复速度，若与从未被代理过的社区无显著差异，则本文高估了代理的破坏力，被裁决可还原为“被遮蔽的伦理召唤”；若恢复显著更慢且伴随“不知道该怎么办”而非“不想管”的自述，则本文的发生学定位成立。

增补二 可裁决预测（三条）

预测一（四重条件的剂量）：在受控的社区实验中逐条拆除四重条件，本文预测“不可撤回”与“无代理”两条的拆除对裁决发生率的抑制最强，而“悬空”的拆除次之——若实测显示抑制强度主要由“他者在场”承担，则本文对四重条件的权重判断需要修正。

预测二（裁决经验的可迁移性）：经历过一次真实被裁决情境的居民，在随后面对一个不同类型的社区事务时，其自行处理（而非上报/求助）的比例高于对照组。若不可迁移，则被裁决只是一次性事件，不构成共同生活的织造单元。

预测三（代理的替代效应而非叠加效应）：引入专业代理机制后，居民自发处理的事务量下降幅度大于代理机制承接的事务量——即总量收缩而非转移。若观察到总量不变或上升（代理只是把原本没人管的事接了过去），则本文的抽空判断不成立。